

挺进五桂山^①

讲述者

罗章有（1921—2010），香山县金鼎镇上栅村（现属珠海）人。1937年参加乡抗日自卫队及中共上栅乡党支部领导的读书班。1940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参加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游击队，先后任战士、班长、小队长、中队长，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副大队长、大队长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，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参谋主任。



罗章有

1946年北撤山东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二团副团长。1950年转业，历任石岐市市长，中山、珠海县委书记、县长，宝安县委书记，佛山专署副专员，广东省贫下中农协会常务副会长。

崖口战斗壮军威

1941年9月，中心县委^②经过详细调查，确定在中山五桂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，发展壮大部队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。

五桂山区南北长40公里，东西宽20公里，山脉蜿蜒，坑谷深邃，山村分散，交通不便。国民党、日、伪对此地的统治都较薄弱。这里，过去曾有共产党地下党员活动，组织过“抗先”、“农民协会”等进步群众组

^① 摘自罗章有：《凤凰山岁月》，珠海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、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编，1998年。

^② 即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。

织，有利于部队的活动回旋和掩蔽斗争。

当时，日军近卫师团进攻南洋，逐步撤离中山，留下不足千人，守石岐、拱北、唐家、横门四个战略点，以伪军第30师维持治安；伪县政府扩组护沙总



英雄的五桂山（萧亮忠摄）

队，强化敌伪统治；土匪活动猖獗。加上从1940年以来我们部队掩蔽埋伏下来，群众不了解情况，以致情绪低落。根据这样的情况，中心县委决定在开辟五桂山根据地前要打几个胜仗，以壮军威，鼓舞士气和人心。

于是决定先打崖口。

伪护沙总队在崖口驻扎了一个中队，约50人。中队长谭玉良十分顽固。九区距崖口相当远，我们计划远道夜袭，队伍不宜大，只去70人。当时我们的中队驻牛角围，欧初的中队驻石根围，两地相距虽只有20公里，但水网分割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到大有围集中，借蔗林作掩护，联络当地的老党员冯连枝、唐明，发动大有、乌沙围的群众支援我们出击。

时值11月下旬，天气寒冷。出击的当晚7时许，我们70人分乘从群众中借来的10多艘木艇，装作出海打鱼，趁退潮时顺流而下。途中要经过几段珠江主航道，要避过敌人的巡逻艇。划艇约3小时，到达预定登岸地点小隐灰炉涌。10时开始行军，走了一宿，天亮时歇宿在合水口里村。该村为四区区委所在地，民兵可靠，有群众基础。我们白天睡觉，养足精神，准备晚上作战。

太阳下山了，我们从合水口里村摸黑出发，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崖口。按预定方案，王鏊带部队攻祠堂，谭桂明和我带手枪队负责捕捉伪护沙总队中队长谭玉良。王鏊带队迅速攻下了目标。我们摸到谭家，才发现进门困难。原来谭玉良住在深巷里，巷口设了坚固的木栅栏（一种用碗口粗硬木围成的栅栏），必须打掉才能进去。几经周折，木栅栏被打掉了，但同时也惊动了敌方。他们在屋内负隅顽抗。谭家的大门用厚硬木制造，

我们几个壮汉又踢又撞也无可奈何。敌人从屋内射击，子弹穿门而出。幸好谢立全^①有经验，拉一把踢撞门的同志，迅速向旁边闪开，才避免了伤亡。踢撞无效，调两挺轻机枪来攻打。边打边喊话，命令他们投降。他们害怕了，只好开门投降。这一仗，生俘了谭玉良夫妇、国民党敌方部队排长苏连根夫妇及警卫8人，缴获快制左轮7支。

战斗结束后，部队领导认为谭玉良很坏，不杀则难以控制崖口，便处决了他，释放了他的妻子和警卫。这一仗，消灭了谭玉良中队，缴获轻机枪1挺、步枪20多支、左轮7支，我方无一伤亡。我们带上战利品，10时半开始行军回灰炉涌，到达时已是凌晨1时半。紧接着，乘来接应的艇回大有围，回到时天已大亮。

以后，我们又打了一仗。四区伪区联防中队在大环桥头设岗收行水^②，驻一个排伪军。我们派了一个排去袭击，战斗顺利，俘获了一个班敌人，缴了8、9支步枪。这一仗，速战速决，当晚出击，战斗结束后当晚回驻地。

进驻老虎窝

1942年1月，领导决定我和黄智（黄衍枢）带领先遣队18人进入五桂山，为建立根据地打前站。这时，靠近崖口的翠亨、石门的乡民代表杨正国、甘玉藻来找部队商量。双方协定，以我们先遣队18人为主力小队，以杨正国为小队长另筹组一个小队，共同成立杨日韶中队，我为副中队长兼主力小队队长，黄智为指导员，全部供给由当地负责，我们则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。后来他们因经济困难没有供给我们，我们只好一面精简他们小队（只留几个战士编入我们小队），一面到处筹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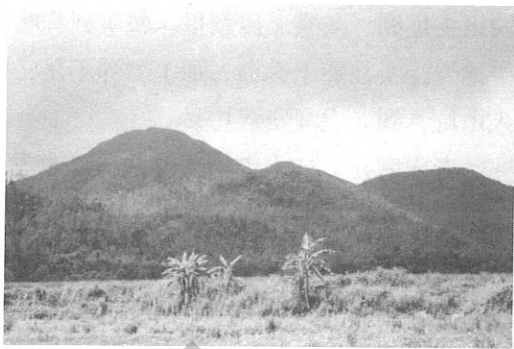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初入山区时，力量小而弱，当时共产党又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。为了不暴露自己，利于隐蔽斗争，我们采用“民利公司”^③（挂国民党挺三支队旗号）梁伯雄大队杨日韶中队的名义。“民利公司”在山区一带曾到处打劫勒索，谋财害命。群众既恨它又怕它，但梁伯雄大队是抗日

① 谢立全时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，负责军事工作。

② 指过路费、买路钱。

③ “民利公司”是沦陷初期中山三区、九区的势力潘惠、梁自带等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堂口，成立时因沙田区的人大都不识字，就让当教师的梁伯雄帮忙起名，梁说“要为民谋利，就叫‘民利公司’吧”。故名。

的。开始时，群众对我们误解，以为我们也是匪类。有一次，我和8位同志到长江乡进行调查时，群众就把我们当土匪打，后得爱国人士、地下党派任合水口里乡乡长刘震球（刘智明）出面做工作，才化解了矛盾，解除了群众的疑虑。



合水口村后山——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

同年2月，第二主力中队六、七十人，由欧初同志带队进入五桂山与我们先遣队汇合，驻合水口乡。3月，第一主力中队40多人，由卫国尧、谭桂明带队进入五桂山区，也驻合水口乡。

我们进入山区的先遣队，第一个任务是调查了解，摸清情况，着重了解民情、敌情、友情，为主力部队及上级机关制定各项决策提供依据。我们先住在石门九堡。那里有22条自然村，还有邻近的、现今属珠海市的上栅、那洲、永丰、南溪、翠微、里外神前、银坑、上场、会同及马溪旗岭等24条乡村。我们逐村了解情况，为期约4、5个月。当中也不断打小仗，小范围出击敌人，以解决给养和扩大宣传，争取群众了解我们。

经过调查，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饱受日寇、伪军的欺凌。日军经常来扫荡，不但随时以通匪为名枪杀乡民，还要每亩田收100—150斤的军谷和军柴；国民党敌方反动派武装收田赋、“保护”费，每亩田收50斤谷；土匪则收“春水费”、“开耕费”、牛票（耕牛保护费）。对稍富裕的村民或华侨家属则绑票勒索。群众对日、伪、匪恨之入骨，抗日情绪高涨。同时，我们也掌握了敌、伪、土匪据点的兵力、武器和他们活动的规律，了解到一些可以争取一起抗日的统战对象，如早期的雷雄、钟汉明（后来他们都变为反动派），五区区长郑星池、六区区长林哲等。这些情况为部队开展下一步工作，制定各种政策、方针、原则和对敌斗争的具体目标、作战时机、方针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我们先遣队初到山区时，因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，害怕会引敌人来烧杀，不敢让我们进屋居住，加上敌人不断来扫荡，所以我们多是住在农民

的田头瓜棚、灰寮、砖寮里。每听到狗吠声就得走避，经常一夜要转移几个地方，实在疲于奔命，加上营养不足，体力难以支持。于是我们决定深入山坑，到老虎窝安营扎寨。

老虎窝在五桂山中。据说从前有老虎出没其间，故而得名。此地离村8公里，从石门进去要翻过3个山坳，从合水口里村进去要翻过400米的箭竹山，平时人迹罕至。我们在老虎窝驻下后，白天下山活动，晚上住在山窝，虽然比较安定些，但蚊子很多。我们一面用干草、湿草混在一起烧，以烟熏蚊，一面用被单或衣服从头到脚裹着全身，才能入睡。当时在日寇、土匪的抢掠压榨下，人民生活贫苦，没粮食吃，就吃蚬肉、椰菜。由于缺乏淀粉，不少人生肠胃炎，有的因此病死。尤其圩镇，饿殍遍地，石岐每天收路尸一百几十具。我们游击队的生活也极端困苦。群众没有吃的，我们不忍心向老百姓要粮。由于缺乏营养，患夜盲症的人增多，大大增加了夜行军的困难。1943年情况最严重，一个中队白天用一小时行完的路，夜间要通宵才行。因为看不清路，一个拉着一个走，像幼儿牵扯着衫尾过街一样，怎能快速呢？

1943年春天，我们奉命从老虎窝开进石鼓挞石榴坑村（今五桂山区政府所在地）了解情况。快天亮时，我们进入古香林一间庙，原准备从那里借些米煮饭，但庙里只剩下一个和尚，没有米借给我们，一时间又买不到米。大家又饿又冷，只好在庙门前烧火取暖。门口有几棵假石栗树。一位战士拾了几颗掉下来的干果，煨熟，吃起来很香。大家高兴极了。有6、7位同志一连吃了几颗。不久，大家都头晕、肚痛、眼花。原来果子有毒。有7、8位同志由于睡熟了，没有吃果子才幸免。我们一直躺到下午，多喝些水、稀粥和吃些生草药，精神才逐渐恢复过来，然后取道长江崧埔回老虎窝。

我们过了6年的艰苦生活，不仅没领过生活费，连起码的吃饱穿暖也是奢望。6年间，只补充过衣物两三次。一人只有一条裤子，破了补，补了破，补丁加补丁，原来的布料已经难以见到。无论冬夏，在河溪中洗澡，我们都是把衣服洗净晒干再穿上。战士贺权是个12岁的通讯员，一早从石门送信去凤凰山白马队，跑了10多公里山路，回到交通站已经又疲又饿。偏偏这时又有紧急情报要送去三乡平湖，任务又压在他肩上。去三乡平湖有6公里，不去不行。他叹气说了句：“冤枉，真难捱！”谁料

到这“难捱”二字竟成了他的绰号，传遍部队。至今同志们见面仍昵称他“难捱”，而不称其姓名。当时夜间照明，用的是客家人的“藜子”（一种经水浸数十日后晒干的竹子），谈不上用手电筒。我们从1942年6月至1944年6月两年间住在老虎窝，搭了3次草棚，另在佛径、正坑各搭过两次，在东坑搭过1次。敌人“六路围攻”、“七路围攻”，攻一次烧一次。虽然草棚烧了，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浇铸过、经艰苦斗争磨炼过的革命意志没有被烧掉。正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夜袭下栅

在进驻老虎窝前后这段时间，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调查了解，摸清情况。当时日军近卫师团2万多人，在翠亨设司令部，在唐家、拱北、三乡和雍陌设据点。伪军李芬联防中队驻下栅圩，黑骨祥（即王祥）汉奸伪联防大队驻坦洲，三乡有“飞天鸭”郑东镇联防队，四区有阮强联防中队。土匪活动也猖獗。在外围，打着“挺三”（国民党挺进第三支队）梁自带的旗号，林晓占山场，冯草龙占横门涌口门，何联占南山脚下的黄宁堂村，五桂山中还有卢堂、甘土旺、甘雨生几股小土匪。友军钟汉明、郑星池在五区、六区都有武装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开展活动遇到很多困难。特别是供给，更是困难重重。加上翠亨人杨正国当小队长的乡警队，收编了卢堂的土匪队伍，有二、三十人的供给要解决，困难更大。出路何在？一是裁员，清理遣散当过土匪的，只留下表现较好的战士；二是请地方支援。当地有位杨伯母（杨日韶的母亲），经她的活动，从公尝中借来600斤米。这样，每天每人可以吃1斤米。然而每天都要转移营地，要跑几条村，劳动强度大，不久这几斤米也就吃光了。此时，卫国尧同志出面与各方面谈判，请求支援抗日。这些人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拥军模范
杨伯母（杨日韶母亲）——谭杏。其一家八口全部参加抗日斗争，大儿子杨日韶、二儿子杨日璋在战场上牺牲。

表面支持，实际都不落实。

总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派人与李芬谈判，要求他秘密抗日。派去游说的是六区伪区长卓君乙（此人先后被我们“四擒四纵”。我们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不敢违抗）。卓君乙与李芬谈话后，传回话：“张民友（罗章有）这样嚣张，有本事就打过来。打得赢的话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

这时谢立全同志也来了，与大家一起商量，必须解决经济问题。那时，崖口虽然有我们的粮仓，但要首先供给上级部队，顾不上我们。出路是向敌人开刀，不能向老百姓要。我们决定向李芬开刀。因为李芬所驻的下栅，是战略要地，把它打下了，政治影响大；下栅的商业多，市场活跃，有物资，税收也多。

目标确定了，便派人去侦察。原来李芬并无军事经验，是靠巴结伪县长欧大庆^①当上中队长的。他的副中队长会“使枪”，不过使的是大烟枪；也有计，只是敲诈勒索、克扣粮饷之类的诡计，对军事则一窍不通。火力方面，他们有两挺旧式轻机枪、30多支步枪、几支短枪，厉害一点的便是那几支短枪。

情况了解清楚，便作出击部署。组织10余人的冲锋队，我当队长。欧初带领几十人作外围警戒和接应，警戒唐家、石岐两方之敌。出击时间是4月^②下旬的一个晚上，7时下山，9时突袭。到了敌人驻地，我带手枪队摸上去，活捉了哨兵，向敌营先掷进去一个手榴弹，接着谢立全扫了一轮机枪。在烟雾的掩护下，我们直冲入祠堂后座去抓头头。在一间房子的鸦片烟床上，伪中队的两个排长和事务长、副中队长都在。他们尚未反应过来，便被我们一举擒住。黄智带一个加强班，冲到祠堂的大厅抓士兵。卢少斌带一个班在祠堂的后门把守，防止敌人从后门逃跑。当时，有的伪兵正在洗澡，光着身子被俘。这次战斗，我方无一伤亡，全俘伪军一个中队，缴得子弹一千多发、短枪4支、步枪20多支、机枪2挺（一为平射机，一为牛角机）。伪中队长李芬当晚在石岐未回来，侥幸逃脱了。打下了下栅，我们了解到唐家密侦队长调拨支援日军的2万多斤谷存在同丰米机店。于是就近发动石门、永丰的农民去搬粮，搬出来后与部队对半分

① 欧大庆在中山沦陷后至1942年任伪县长。

② 1942年。

享。又将与汉奸有关的布店打开，取得土布、麻布一大批。战士们做衣服也有布料了。

经过这一仗，游击队的影响迅速扩大，收粮收税顺利多了，为解决部队的供应开了路。

扫清股匪 站稳脚跟

肃清土匪，是群众的强烈要求。当时较猖獗的土匪，大股的有何联、冯草龙、林尧这三股。他们与国民党的挺进第三纵队第三支队梁自带勾结，官匪一家，挂“挺三”大队长的旗号鱼肉百姓，打单勒索，放牛票（耕牛保护费）。春耕前种还未播，就收“春水费”，每亩三、五十斤谷不等，夏收、秋收后还得交“保护费”，说收多少就要交多少，不得有违，违者遭烧杀。小股的如卢堂、甘土旺、甘雨生，也到小村庄打家劫舍，还混入我们的队伍里来，伺机搞暗杀。我成了他们的暗杀对象之一。

1942年5月，土匪头子卢堂死了，其副手甘土旺和几个土匪被杨正国收编为乡自卫队员，编入我们的中队。过了一段时期，他们认为跟杨正国“没得捞”（没前途），便暗里投靠神湾伪联防大队长曾添意。曾添意曾对他们说：“你有枪，消灭张民友，缴得多少枪来，便封多少枪的官”（即枪装备够一个排的当排长，够一个连的当连长）。这些两头蛇们的活动，我们一时间没有察觉出来。

1942年5月上旬，部队组织去攻打阜沙。卫国尧、谢立全两位领导决定把我留下，完成收税的任务。部队出发后，我们准备将4月间打下栅时缴获的两挺老式机枪收藏好，以便以后修理好才使用。我和甘润洪、甘北棠、贺北水、毛乌佬5人去埋枪。在贺北水家里，我们先把枪涂上了油，再用油纸包好，外用麻包捆扎妥当。晚上10时，我们冒着连绵细雨把枪抬到贺屋后山禾坪岗，埋入土里，并造了一个假坟以作标记。甘土旺通过甘北棠了解到这情况，便偷偷地把那两挺机枪挖出，移埋到石门攸福隆村沙河的沙滩上。他想伺机杀了我之后，带着枪去投靠曾添意，好谋个官职。甘土旺表面上对我们是恭顺的。他有一支三号左轮，甘润洪也有一支“金山艇”（左轮）。有一天，我带着贺北水、毛乌佬、贺南、甘润洪、甘观林和甘土旺6人去官塘找卓君乙，要他召集乡保长开会研究交税问题。

开完会我们连夜回驻地。行进间，贺北水、甘观林走在我前面，毛乌佬紧跟着我，甘土旺和甘润洪在毛乌佬后面。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行至兴业围水晶坑（现中山珠海分界处）时，甘润洪突然开枪向我射击。两发子弹擦身而过。他在开枪的同时大喊“土匪来了！”（当时根本没有遇到土匪）我们立即卧倒。而甘润洪却在夜幕中逃跑了。我们回到驻地。甘润洪一直不敢回队。不久，攻打阜沙的部队回来了。我们准备把埋在贺屋后山禾坪岗上的机枪取回来修理应用。谁知道挖开假坟一看，枪已无影无踪。

我把遭遇冷枪和失枪的情况向卫国尧同志作了汇报。经过分析，我们都认为甘土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。但我们不动声色。甘土旺出入带着枪，我们也不管他，只是提高了警惕。部队出发去崖口，也把他带上。到了崖口，我们跟他说，攻打鸡头角，武器不够，能否把他的左轮枪借出来用。他在犹豫的时候，我们又说，不借枪，随队出击也可以。他怕死，无奈把左轮枪借了出来。甘土旺的个头大，虽然没带枪，但一对一是对付不了他的。我们派了几个人盯着他，后来把他关押起来，审问他偷挖两挺机枪的事情。他招供了。我们立刻派人把机枪找了回来，证明他说了实话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把想投靠曾添意的企图说出来了。鉴于这家伙过去坏事做得多，在燕子埔、鲤鱼山、佛径等地都抢过劫，民愤大，如今又匪性不改，便把他和他的3个同伙处决了，留下甘北棠（土改时被镇压）、甘观林（后偷渡去了澳门）。

扫清几股土匪后，群众知道我们与土匪并非沆瀣一气，认清我们是真正保卫他们利益的，对我们逐渐产生了好感。

会同村的燕子埔是三家村，有一户叫甘记友（原会同村副村长甘斌的父亲）的中农，被土匪抢劫过两次。他母亲说，土匪白天来拉牛，还要杀鸡杀鸭请吃。第二次来“借”牛1条，不容分说，拉了就走。我们向她说明，我们是抗日的队伍，有责任打鬼子、汉奸，消灭土匪，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甘记友等了解我们部队的性质和任务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。从1942年至1949年，他家一直是我们的可靠据点。从五桂山往凤凰山，走山路必经燕子埔，所以保住这咽喉通道十分重要。

银坑，村民以打鱼、养蚝为业。土匪冯草龙向该村打劫勒索10万斤谷，声称必须按时缴交，否则烧村。眼看还有5、6天就到期了，村民害

怕，纷纷逃走。他们来向我们求救。我们用梁伯雄大队杨日韶中队的名义写信给冯草龙，说明银坑是我军的保护地，劝他不要去骚扰。此信果然有效，群众很高兴。银坑从此成为我们海上秘密交通线的据点。

对各阶层做好分析，划清敌友我的界限，争取团结大多数，打击日、伪、汉奸、顽固分子。中山有孙中山、唐绍仪等名人。当时穗港四大公司大新、先施、新新、永安的老板也是中山人。对他们的家属，如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等，我们积极做好统战工作。六区会同村莫仕扬，是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。他的宗族自成一村。其孙辈莫泳如、莫子相致富后，回家乡建设，并创办学校及医院，还在村周围设有护村河。河岸有炮楼，配有8支自动步枪。香港沦陷后，洋行下属的分行经理回来后生活困难，只能拆屋和变卖家具度日。下五区的黄茅斜村有一群西欧式的古堡建筑，房子有中式和西式的，合起来足足可以驻扎一个团。主人是清朝的外交官，是夏威夷国王的义姐夫。日本鬼子抄了这一家，家人全都迁往澳门。对这些人，我们都认真做好统战工作。对罪恶多端、民愤极大的则坚决打击，如崖口的谭本立，唐家的密侦队长梁孔先、伪乡长梁鼎先，三乡的伪联防大队长“飞天鸭”郑东镇和黑骨祥。这些人顽固亲日，欺压群众，罪恶累累，民愤甚大。我们了解了情况后，于1943年4月去镇压郑东镇。他霸占大小公尝万多亩，捉住他时，从他家搜出港币10万元（当时港币贬值，只值内地货币30%），白米和布匹一批，还有他戴在身上的一斤多重的金链。我们捉住了他，没有立即枪决，而是把他关在老虎窝里，先清算他家的财产，然后才把他杀掉。杀了“飞天鸭”，五区人心大快。接着，我们成立了区武装队伍——雪花队。

四区的局面相对比较难打开，只能控制崖口的一个点，而且必须把驻在左步的伪联防中队打掉。伪中队队长阮强也是个死硬分子，抗交抗日军粮。我们以一个连作后援，由欧初前去跟他谈判，我带两名身体强壮的战士协助。欧初带一警卫进去商谈。趁阮强的警卫外出买烟之际，欧初迅速拔了阮强的枪。两人扭打起来。我听到响动，立即进去协力擒住了阮强。谁知道他们事前有所准备，从炮楼上开枪射击。我们边打边撤，至巷口时，就地枪决了阮强。敌人不敢追击，我们安然撤退。处决阮强后，下四区的局面逐渐打开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原驻石岐、三乡、唐家、翠亨的日军大部分调往太平洋战场，驻中山的兵力大大减弱，出现了有利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。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根据珠江三角洲的斗争形势，作出“发展中山”、“开辟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”的决定。

1941年底，中心县委委员谢立全到中山九区牛角村，召开驻九区抗日游击队干部会议，传达贯彻中心县委的指示。会议决定把原来在河涌水网地带活动的中山抗日武装主力，逐步转移到五桂山区。

1942年1月，中心县委派罗章有、黄智（黄衍枢）带领18人作先遣队到五桂山区合水口、石门一带摸清民情、社情、敌情，为建立根据地打前站。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，很快站稳脚跟。

2月，欧初带领第二主力中队六、七十人进驻五桂山，与罗章有先遣队汇合。

3月，卫国尧带领第一主力中队十多人也转移到五桂山。三支部队共100多人，分别驻在白企、贝头里、长江、石门等乡村。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。延安派来珠江三角洲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干部、中心县委委员谢立全，代表中心县委驻五桂山领导中山的抗日游击战争。

5月，中心县委为进一步加强对抗山武装力量的领导，将五桂山的两支主力中队整编，成立中山抗日游击大队，隶属中心县委领导，下辖两个中队，120多人。

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中山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壮大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。

〔整理自《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》（第一卷）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。〕